



下

亂世梟雄

吳佩孚

三〇、倒阁政潮

吴佩孚回到洛阳，继续练兵。在他的心目之中，西南是他的后顾之忧，奉张是他的当前大敌。因此他在洛阳所积极从事的厥为两端，一系安定西南，一系扩充武力，企图一战而消灭奉张。至后，他统一中国，抵御外侮的雄心壮志，方可初步告成。所以当一九二一年九月二日，吴佩孚乘胜余威，重弹“国民大会”的老调，拟定了会议的主要条款如下：（一）地点在庐山，名称为国是会议，可分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两种；（二）国民会议为最高会议，由各省省议会及各法团公推代表（每省三人，蒙古、青海、西藏各推二人）组成之，被推者不限于省议会及各法团的成员以制定国事为其任务；（三）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队每省（区）公推代表三人，海军全体公推代表六人，中央军公推代表六人组成之，以议定军制及裁兵方案为其任务；（四）国军会议决议须交国民会议通过，如被否决，得声叙理由提请复议，如否决二次，即应修正；（五）国民会议在双十节前开会，得推定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

(六) 国民会议、国军会议的决议均用国民会议名义公布之，公布后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

吴佩孚为什么要把“国民会议”改变为“国是会议”，而在“国民会议”之外又要加上一个“国军会议”呢？原来他自己是秀才出身，懂得伪造民意的一套手法，但是他的同道中人都是一些老粗，都是只知有“军意”而不知有“民意”的，所以加上“国军会议”使他们乐于接受。这个方案是吴佩孚儿女亲家张绍曾和张謇共同草拟的，本来打算用吴佩孚的名义发表，但是吴佩孚上次放了一个空炮，不愿意再放第二个空炮，因此涂去了自己的名字而请张绍曾用个人名义，于九月二日发表。

电报发表后，首先通电赞成的就是起草人之一的张謇。九月九日，汉口成立了庐山会议筹备处。十日，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杜锡圭、孙传芳联名通电赞成庐山会议。十月十一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也有联名通电表示赞成。看上去这次建议不会再是空炮了。但是，卢永祥首先表示怀疑，陈炯明通电反对，张作霖被动列名并非真心赞成，而全国人民对吴佩孚的本来面目已经认识清楚，因此这个倡议仍是“曲高和寡”，并无下文可考。

吴佩孚发起庐山会议的目的，仍然象以前发起国民大会一样准备通过会议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如果孙中山不肯下台，即由新政府下令加以“讨伐”。由于会议并未实现，他的这些计划只能搁下不提。

家庭里发生了一项变故，郁郁闷闷，住在保定别墅的李氏夫人，突告一病不起。吴佩孚得讯至表伤悼。李夫人美而慧，明眉皓齿，艳光照人。她长身玉立，体态丰满，当年吴佩孚驻防长春，同僚中妻小眷口，少妇长女不下数百位，论聪明美丽与风姿谈吐，李夫人允称第一。张佩兰未曾进门以前，她和吴佩孚十分恩爱，遗

憾的是她不育，因而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藉口下，经吴太夫人一手安排，逼着吴佩孚又娶张佩兰。当时，吴佩孚为此非常痛苦，一则违反他平素一夫一妻的宗旨，二来深感愧对热爱着他的李氏夫人。他曾对知己朋友大发牢骚：

“中国人蓄妾，是一种野蛮风俗，男子以原配为正宗，妾侍为从属，不过人家不论娶多少妾，一概分开来住，当然不会感到相爱时的诸多不便。可是如今我没这个资格，非要叫我娶了妻妾隔邻而居，这岂不是找我的麻烦，让我左右为难，没好日子过嘛！”

朋友们还跟他开玩笑，说是：

“哎，吴二哥，你要知道你们老太太这么做是有深意的啊，你不是常说你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吗？西洋有一句谚语：‘能驾驭一妇人，可以与问国家大事，能驾驭两位妇人，即可调和阴阳，治理天下。’你们老太太前后给你娶二位，正是要磨炼你的志气和手腕，培养你收揽天下英雄的预备工夫！”

后来吴佩孚自关外回北平、保定，李张二位夫人又同在一起合住了两年不到。在这一段时期，吴佩孚经常唉声叹气，而把“没法子，没法子”挂在嘴上，当做了口头禅。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派曹锟率第三师南下，驻防岳州，李夫人曾大吵大闹，坚持不许吴佩孚上湖南，闹得吴佩孚无计可施，乃由曹锟夫人出面“调解”，由吴佩孚给李夫人在曹家宅第“光园”旁边盖一幢房子，供李夫人居住，每月则由吴佩孚供给三百两银子的生活费，当时还找了数名年轻伶俐的女孩子陪伴她。这便是两夫妻正式分居之始。

当时李夫人非常焦躁懊伤，渐渐的便萎靡颓废，她抽上了鸦片烟，以致一个月三百两银子都不够用，而由曹夫人瞒着吴佩孚暗中补助。一九二一年李夫人逝世，濒死前还喃喃的喊：“子玉，子玉！”使吴佩孚在洛阳听到说时，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他感慨

万千的说：

“过犹不及，这话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女人婚嫁以后不能生孩子，唯有将全部爱心放在丈夫身上，乍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只不过，过份之爱因而发生过份的嫉妒，将会演至不可救药之苦，每一想起，心中总是十分的难受！”

为李夫人殓葬事宜，吴佩孚自汉口回洛阳后，他曾跑过保定一趟，为她营葬。直系首要吊唁李夫人之丧因便召开了保定会议，吴佩孚在十六日的秘密会议上建议恢复法统，改造政局，逐走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职，采取这些行动来进行全国统一。这是吴佩孚自战胜皖系以来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在会议上没有获得通过。吴佩孚又提出另一建议，孙中山高唱北伐，南北战争迟早不能避免，不如先发制人，本人愿意统率十万雄师去打广东，后方接应请老帅（指曹锟）全力支持。吴佩孚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引起了参加会议者的一致不满。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冷言冷语地说：“咱们打陕西，打湘军和川军，打得精疲力竭，军饷又有困难，现在总应该休息吧”。曹锟频频点头说：“对，咱们应当休息一下！”因此，吴佩孚又改变口气提出“先守后攻”的计划，大家未置可否，会议就是这样无结果结束了。

旋返洛阳，吴佩孚便积极筹备长江联防会议，而于十一月四日宣告揭幕。参加长江联防的各省，计有河南、湖北、江苏、江西和浙江，吴佩孚为解除后顾之忧，总算有了这么一道防线。隔一个月，吴佩孚礼聘江东才子杨云史（圻）入幕，担任他的机要处长。这杨云史是江苏常熟人，系出江东名门，他中过顺天乡试南元，任过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后来弃官为商。在南洋群岛购地一万二千亩，组设种植橡胶公司，不巧遇上欧战，橡胶价格大跌，所业三年不治，鞠为茂草，因为欠缴地价税，全部财产被英国人没收，于是快快回国。后来入过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幕，宾主

之间处得很不愉快。杨云史诗文冠绝一时，他曾写过一首感秋诗，内有：“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悉”之句，挖苦陈光远黷武好货。陈光远有点起疑问他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杨云史怕惹祸上身，便托辞东归。后来同年好友潘毓桂在吴佩孚面前推荐他的长才，吴佩孚大喜过望的说：“这是江东才士呀！”旋即礼聘他为机要处长，两人极宾主之欢。杨云史到洛阳后写信回家，告诉他的太太说：

“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

由此可知他和吴佩孚的相得。

开过一次保定会议，由曹錕出面召集。这也是出自吴佩孚的主意，他认为直系近年以来权力分歧，统一无策，问题重重，大都由于直系领袖松弛懈怠使然。他要求直系集中力量，对奉系时刻戒备。在这一次会议席上，吴佩孚大声疾呼，要大伙儿拿出以前击败皖系的蓬勃朝气来。

直奉两系合作之局，一开始奉系便拣了个大便宜。吴佩孚亲冒锋镝，攻坚摧锐，拼性命打了一场大胜仗，将皖系军队一举击溃，张作霖则跟在后面接收分赃，操纵政局，明明坐享其成，偏又是那么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凡此都是直系将士所断乎不能忍的。一九二一年湘鄂之役，吴佩孚孤军深入，也是出生入死，行险侥幸，保全了直系心腹之地湖北这一块地盘，让他的部将萧耀南，升了湖北督军。可是这件事看在张作霖的眼里，又觉忌刻恚忿，恨不能分一杯羹。他从来把吴佩孚看作是偏裨小将，现在这个小将一跃而为巡阅使，和他并驾齐驱，因此一怒而辞蒙疆经略使，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再负责。奉张认为王占元并不属于曹、吴一系，直系取得湖北地盘，张作霖也必须取得一省地盘才能相互抵偿。他不便把抢夺地盘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于是借题发挥地指责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

师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懂得这是张作霖夺取江西地盘的一个手段，如果奉系夺去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洋政府看出他们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张作霖的气才平下来。张大帅一计不成，又来绝招。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盛大扈从，入关晋京，当时北洋政府因为财政支绌，正在焦头烂额，国务总理衙门，整天在为索饷索薪，内债外债忙得团团乱转，不亦乐乎，靳云鹏眼看年关将届，不能再恋栈了，他决意辞职，说什么也不肯再干下去。于是趁此机会，张作霖便想把交通系的首脑，梁财神梁士诒给招了出来，让徐世昌发表他为北洋政府第八任内阁总理。

有一回，吴佩孚和他的知己好友，心腹亲信闲聊，聊出了直奉之战的原因。他说：

“辛酉之役（他指的是一九二〇年的直皖之战），我从湘南回师，讨伐安福系，一战成功。作战时期，张作霖也曾领军入关有以声援。仗打完了，有关诸将领齐集天津，开会讨论如何论功行赏，仲帅首先站起来说我应居首功，他问大家应该给我那一处地盘，当时我在会场隔壁一间屋里，亲耳听见张作霖在说：‘那小子就让他继张敬尧之后，给他个湖南督军得了’。我一听这话，对张作霖的机警大为惊骇，他怎么就能料中我的心事呢？因而我想，这人不可不防，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那么壮的口气，他必为我将来之敌，于是我决心用加倍于他的机锋，和他对抗。一心一意以整顿民国为己任，而不求功名利禄，甚至地盘地位，我只求当一名师长，以我一名师长的地位监督政府，纠察天下，凡有主张便是公论。于是我不就任湖南督军，率部回洛阳去。”

张作霖称吴佩孚“那小子”，吴佩孚嘴上说是不以为侮，而只惊异于奉张口气之大，心思之敏，但是在他内心里只怕还是不无耿耿的。论年龄，吴佩孚比张作霖大一岁；谈出身，一个中过秀才而又在保定陆军学堂测量科以第一名毕业，一个则起自草莽，当过胡匪接受官军的招安；云门第，则两人一般的是贫家子弟，父亲早故，由慈母抚养成人；曰功勋，安福之败是吴佩孚出奇制胜浴血鏖战得来，张作霖奉军，只能说是呐喊助威，放过了几枪而已。因此在当时那种场合，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故作轻蔑，任何人也会为吴佩孚抱不平。不过吴佩孚高人一等，他在忿懣之余，犹能觉察得出张作霖对自己含有敌意。于是他早已料到直奉之战断然难免，不得以加倍于张作霖的机智，准备抗衡。

分析张作霖的心理，他并不是一个目空四海的骄傲狂妄的桓桓武夫。在北洋军阀上百个成了“功”的人物之中，他的机警敏锐，手腕灵活，可以说得出类拔萃，数一数二的；他的成功完全由自身的聪明智慧得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他又有足以藐视吴佩孚的履历与资格。当吴佩孚级职上尉在给日本人当情报员，张作霖恰在那年被张锡銓、增韜收编而一跃为管带，等吴佩孚在第三镇熬到了管带一职、张作霖却又遥遥领先当了第二十七镇的统制官。所以说在逊清末年他已经跟吴佩孚的老长官曹锟，有着相等的地位和身份。

北洋传统，视部下为豪奴。天津之地，曹张已经成为了亲家，张作霖当然也可以跟曹锟一样的以主子自居，开口一声“那小子”。若是那班谄媚阿谀，不讲骨气的部下，还会以为这是张大帅跟自己表示热络，随便轻松以致出之于昵称呢。

然而当时的张作霖，他对吴佩孚故表轻蔑，却既不是“骄狂自大”，也不是“在拉近乎”，彼时彼境，面对曹锟那种庸碌懦弱的对手，他这么做，确实有他相当的机心，同时亦为政治手腕之

一种。直皖之战，吴佩孚应居首功，这个说法是放乎四海而皆准，无人可以否认。张作霖倘若不要这一手，气焰特盛，压例曹吴，他凭什么高高在上，操纵会议而坐地分赃？要是他礼敬英雄，谦恭下士，把吴佩孚抬出来跟自己分庭抗礼，均沾利益，那么，吴佩孚这个对手，岂有曹卖布那么好相与？

明知，便豁然可知吴佩孚当时听到那句“那小子”，为什么会惊骇至此，立刻便将张作霖列为来日的大敌，而不得不以加倍的机智以对抗了。吴佩孚亲口叙述的这一幕，跟三国演义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直奉之战爆发的近因，则为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之组阁。梁士诒，字燕孙，广东三水人，比吴佩孚大六岁，一八九四年应殿试，得了二甲第十五名进士，时年二十六。一九〇三年再应经济特科考试，中一等第一名。可是有一位军机大臣在慈禧面前进谗言，说：“一等第一名梁士诒系广东人，为梁启超之弟；其名末字又与康祖诒（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当时慈禧深嫉新党，居然弃而不用。后来邮传部成立，梁士诒得唐绍仪之汲引，方始成为邮传部的要员。清廷初设铁路局，即派梁兼任，为日后交通系政客之肇基。袁世凯组阁，任他为邮传部副大臣，从此襄助袁幕，参与密勿。民国成立，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梁士诒任秘书长，并且特许他参与各铁路事，兼任交通银行总理。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他曾是袁世凯左右炙手可热，权倾当朝的人物。

梁士诒又是袁世凯称帝的幕后策划者，为了替袁世凯筹战费发行纸币三千万元，使北方金融陷于绝境，便是他的“攀龙附凤”之作。帝制失败，袁世凯一死，惩办祸首，梁士诒被黎元洪下令查办。他逃出都门，后来到了日本。他最怕段祺瑞，段祺瑞当政，他永远出不了头。一九二〇年直皖之战，皖段一倒，他立刻大肆活动于曹张之间，亟谋东山再起。他曾面谒直曹，对曹三

爷以言语挑逗，曹三的回答是：

“燕孙（梁士诒的号），你们何不先替我筹五百万的军费？”

一句话把他吓跑了。于是梁士诒便利用拥他为首的交通系要角叶恭綽，极获张作霖信任，派郑洪年拿了叶恭綽的密函到奉天去游说张作霖。当时曹张还在直奉合作的蜜月时期，张作霖自然要考虑直方的意见，因此他答复郑洪年说：

“只要曹仲珊赞成，我这边没有问题。还有一层，徐大总统那边的关节，似乎也要预先打好。”

郑洪年听他这么说，喜出望外，他为达成梁士诒所交付的任务骗取张作霖一言九鼎的推荐，造成即成事实，当下不惜撒了个谎说：

“仲帅早就同意燕老（指梁士诒）出山了，徐大总统那边更不成问题，大总统跟燕老在前清邮传部时代便是同僚，燕老入民国当袁大总统的秘书长，和徐大总统也合作得很好，他们二位有二十年的交情。雨帅（指张作霖）只要您肯推举，一切的事情，燕老自会布置，断不至于让雨帅为难。”

张作霖信以为真，接下来便商洽条件，最主要的梁士诒组阁，奉军粮饷要优先发给，此外郑洪年又代梁士诒答应“另为雨帅筹饷”，这桩大事几乎已成定局。旋不久到了一九二一年阴历二月二十二，张作霖做四十七岁生日，郑洪年摆出自家人的姿态，为张作霖担任招待。郑洪年是广东番禺人，举人出身，跟梁士诒在邮传部同过事，一直是梁的亲信，交通系的要角。他在大帅府的演出，当然会引起许多拜寿军政首要的猜测。

张景惠时任察哈尔都统，专程前来拜寿，他也颇以郑洪年的活跃、卖力而心中纳闷。他跟张作霖是多年相从的老弟兄，找个机会便率直的问起这件事来，张作霖把这段交涉据实以告，张景惠顿时便摇着头说：

“姓郑的说仲珊赞成燕孙组阁，这话未必确实，一则仲珊近来跟翼青（当时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号）挺要好，二来他若赞成一定会有电报来洽商条件，你可别上他们的当，还是先打个电报问问仲珊看。”

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张作霖。他致电保定，果然曹錕接电以后大发雷霆，他到处找梁士诒不着，便在叶恭绰面前破口大骂：

“燕孙怎么这样荒唐，他想当国务总理，就该从筹款上设法，光凭卖嘴，行吗？”

然后一个电报回复张作霖，声明他决不同意用梁士诒代靳云鹏。张作霖获电也发了脾气，叫郑洪年来骂了一顿，说他如此欺骗，若不看在誉虎（叶恭绰）面上，我非办你不可！郑洪年趁兴而来，铩羽而归。梁士诒组阁一事，自此胎死腹中。

但是梁士诒机会难得，官瘾难熬，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直奉之间争权夺利愈趋激化，明眼人得出来合作之局不会久长，而当时北洋政府罗掘俱空，穷得要命，各部官员薪水欠了二十个月之多，一切政务几陷停顿，而奉张、保曹、洛吴硬逼军饷，闹得靳云鹏内外夹攻，焦头烂额，他实在干不下去。梁士诒眼看旧话重提的机会已到，派叶恭绰亲自出马往说张作霖。这一次叶恭绰动之以下列三事：

一、多筹军饷。

二、联络南方，合作倒直。

三、事成后由张作霖操纵北平政局。

张作霖要梁士诒先把应诺之事办出个头绪再说。

梁士诒得讯大喜，为了求速效说办就办。一九二一年八月他托词回广东三水原籍为他父亲梁知鉴做寿，十一月十日由香港转上海，特地到杭州相庐、七里泷游山玩水，其实他是为了“三角同盟”一事专程南下，连络广东与浙江，密谋共同推翻直系，打

倒曹吴。待十一月底他完成任务，乘津浦路车北返，在洛阳的吴佩孚已经得着了消息。他攻心为上，直接打电报给他的老上司浙江督军卢永祥，不惜指出——

“张作霖身起胡匪，盗心未改，历年以来，残民祸国，罪恶贯盈，固已中外共见。今已于日暮途穷之际，勾结梁（士诒）叶（恭绰）余孽，剽窃公开统一之虚名，隐行蚕食鲸吞之诡计，蒙蔽国人，欺我袍泽。

“试问，年来统一之障碍，畴任其责？中央一切施政，为中外所致憾，而中央乃彼之外府也。掠劫国帑，垄断政柄，权集于一人，祸中于国家，惆怅往事，言之增痛！

“佩孚频年忍默坐视豺狼残噬，狐鼠纵横，隐忍未尝与较。梁氏辱权卖国，远有神宇沦胥之痛（指袁世凯称帝前夕，日人逼迫袁世凯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后来国人定签约之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近有桑梓庐墓之悲（指梁士诒任国务总理以后，第一件外交事件，即为根据二十一条的首四号，将德国人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直接与日本联络，借日本的钱，赎中国的路，然后再交由日本经营，实在是荒乎其唐，滑天下之大稽，宜乎举国舆论哗然，群起而攻之。本案由于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故曰‘桑梓庐墓之悲’，可谓贴切之至，无懈可击）。勉一诘问，同恶相济，张脉愤兴，遂至于此。（表示吴佩孚的一股悲天悯人，无可奈何的情况。）

“犹忆公言：‘胡匪（指张作霖）当政，即国人置而不问，余（指卢永祥自称）亦遁迹海外，不与回国。’（吴佩孚够厉害之一着，覆述这几句话，卢永祥便不能将这封电报公开，或送呈‘三角同盟’的任何一方了），佩孚闻之拳拳不忘，体以力行，以迄今日。

“田督（指山东督军田中玉），合肥（指安徽合肥籍的段祺瑞）面谕：不准助奉，谅公当亦有关（这是吴佩孚举一铁的事实，

隐示安福系不至于和奉张、交通系梁士诒组成联合阵线。因为田中玉也是北洋旧人，对段祺瑞相当敬服）。故佩孚于兹有疑而继之以请也。（疑皖段与奉张之间矛盾以如此之深，而曾请教皖系中坚的卢永祥本人也。）

“一视同仁，固征博爱（讽刺卢永祥个性懦弱，遇事不能当机立断，泾渭分明，于友于敌，总归一视同仁，不分彼此，谓博爱者，无异滥好人，这是卢永祥无法否认的基本性格），然大节所关，令名所系（接下来便以名节劝勉激励），佩孚顾数十年所钦戴之恩帅（指的是他自己和卢永祥的老上司，清军第三镇统制官曹锟），自爱尤厚也（说他洁身自好，较诸老上司‘恩师’曹锟，亦且并无逊色，以此语和老实忠厚的卢永祥共勉之）。

“救国以法（自此句提出他的主张），行法以人（为法治人治之争作一论断），胡逆不去，何以为国？（这胡隐指那胡，胡匪张作霖也。）

“至会议如何公开？制度如何确定？（这是吴佩孚的民主法治精神）付诸耆年硕德，政治名流（接下来便又表白他的长老政治观念），乃佩孚夙夜与公同其祷祝也。耿耿血诚，犹是昔年，（昔年吴佩孚是卢永祥的部下，他在此顺提一笔，也有动之以情的意思。）’知我罪我，惟公教之！吴佩孚敬一九二二年元月二十四日）。”

可是梁士诒在张作霖力保之下，组阁已成定局，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徐大总统明令特任梁士诒为北洋政府第十八任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的时候发表政见，他说他此次之出任国务总理，抱定三大宗旨：

- 一、树立外交政策。
- 二、活动金融经济。
- 三、消弭内战。

事实上上完全是欺人之谈。他当国务总理以后所从事的积极

工作，乃在于扬奉抑直，千方百计为直奉之战作准备。他就职六日后便下令赦免安福系要解通缉犯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内幕则为安福、奉天、交通三系通力合作推翻直系。第二着狠棋是他扣发洛吴的军饷，意在使吴佩孚的十万大军无粮无饷，不久必定溃败，用以制吴佩孚的死命。第三着则为结好日本，取得对奉张的军事财政支援，以便发动大战。第四着则借口财政困难，发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债”。当时全国有识之士，都在注目华盛顿和会中，中日代表所“磋商”的山东问题。一次大战，中日同为胜利之一方，日本人却要接收战败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这种无理侵略是非岂有此理？所以各地学生民众纷纷游行示威，请愿抗议。而在华盛顿交涉的最要紧关头梁士诒却为了取得奉系的利益，指令中国代表让步，答应借日本人的钱向日本人赎回胶济铁路，尤其应允胶济铁路仍归日本人经营，这变成了路没赎成，反而多添了几千万元的国债，与中国堂堂正正的收回胶济路要求，相去何啻千里？于是舆论大哗，都骂梁士诒卖国媚外。吴佩孚见推例梁内阁的时机已到，便发表通电痛责梁士诒，“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这个电报把梁士诒惊得呆了，他做贼心虚地于六日发表一个倒填日期的“微电”（微是五日代号），解释关于筹款赎路问题，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一幕，并且伪装并未接到吴佩孚的电报，所以倒填日期，使大家不疑心是为对吴佩孚答辩而发出的。

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七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借款”之一法，所谓外债并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表示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吴佩孚就象放连珠炮一样，接连发出了

庚（八日）、佳（九日）、蒸（十日）、文（十二日）各电。庚电揭发梁士诒“作贼心虚，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预为立脚地步”；梁士诒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施其盗卖伎俩”。佳电揭发旧交通系借用日款举办沪、宁、汉长途电话的另一阴谋。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庆的电告：“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洋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上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平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吴佩孚在电报的后段慷慨激昂地加以按语说道：“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所指的“谋主”和“公敌”，显然就是梁内阁后台老板张作霖。其电对梁士诒痛诋不遗余力。前段写道：“计自洪宪蹉跎（指梁赞助袁世凯的帝制），埋首五六稔，此次突如其来，而窃高位，挟孽群丑，咸庆弹冠。鄙人与公互无芥蒂这嫌，何至予公以难堪。不谓秉揆未及旬日，伟略未闻，秽声四播。首先盗卖胶济铁路，促进沪宁汉长途电话，援引卖国素有成绩之曹、陆，朋比为奸，实行盐余公债九千万借款。旬日政绩如斯卓著，倘再假以时日，我国民之肥福于公者奚若”！后段劝梁自动下台，写道：“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位，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指五四运动学生火焚曹汝霖宅一事），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文电表示与北平内阁断绝关系，写道：“燕啄皇孙，汉祚将悔”！梁士诒字燕孙，这一句引自骆宾王讨武则天檄的成语），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也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那几天，报纸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跟着吴佩孚应声的有田中玉的庚电（八日），萧耀南的文电（十二日）和铤电（十六日），齐燮元的覃电（十三日）陈光远的元电（十三日），赵倜的铤电，冯玉祥的巧电（十八日）。只有直系首领曹锟并无电报发表。在唇枪舌剑的电报战中，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忍俊不禁。

吴佩孚虽然讥骂不休，梁士诒却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在回电中称赞吴佩孚是“吾国之一奇男子”，还说什么“生平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的鬼话。吴佩孚又去电调侃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梁士诒组织这样一个亲日内阁，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下注定是站脚不住的：在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国家的力量占了上风；在国内，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浪潮汹涌一时。但是梁士诒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又采取了迷惑人的手腕，通电表明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平来交涉。他坚持政府及全国人民应当迅速筹款，立刻完全赎回胶济铁路，自己愿意担任三百万元以为首倡。梁士诒的这套手腕并没有把摇摇欲坠的内阁命运挽救过来。

一九二二年元月十九日，除曹锟外，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联名电请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并强调声明：“应请我大总统乾纲独断，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苟以佩孚等为无状，即请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正诒。倘贤奸不辨，忠佞难分，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遇事直接元首”。否则的话，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将与梁阁脱离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问题的焦点主要是与日本的矛盾，吴佩孚反对以奉系军阀为背景的梁内阁，反对梁内阁的亲日卖国政策，又一次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共鸣，他的军阀狰狞面貌又一次在爱国伪装下掩盖起来。

在此以前，徐世昌采战国魏文侯待乐羊，直至乐羊立功而返，方始示以“谤书一筐”之义，所有反对梁士诒的电，一律束之高阁。唯独这一回问题严重，他乃批了“交院”二字，派人送给梁士诒看。梁士诒一看便晓得徐世昌示意他自己炒鱿鱼、卷铺盖了，他带着电报上大总统府，聊以解嘲的说：

“士诒不敏，累总统操心，今日之局，个人进退毫无问题，我所以迟疑徘徊者，是希望大总统持政不阿，稍稍压抑武人跋扈之风，能够这样，方始可以免了国脉沦丧殆尽！”

徐世昌是三朝元老（清、袁、民国），标准的老官僚，遇上这个尴尬的场面，他便效法老僧之入定，嗒然不答。梁士诒拿他没有办法，就只好说：

“士诒是来辞行的。”

言罢辞出，从此不入府院办公。吴佩孚驱梁倒阁，算是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梁士诒元月十九日向徐世昌辞了行，却是不走也不上辞呈。他等到二十三日，才开始“告假”，同时朝发夕至去了天津。二十五日徐世昌下令梁士诒“请假照准”，特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

后台老板张作霖得了消息，不胜恼怒，因为这件阁潮的发生，正足以表示张雨帅栽在吴佩孚的手里。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倒梁阁意在反奉，张作霖不得不亲自出马为梁士诒内阁辩护，并反击吴佩孚对梁内阁“不加谅解，肆意讥弹”；“不问是非，辄加攻击”。吴佩孚也不示弱。通电全国：